

◀ (上接4版)

学科意义的美术史——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层面全面拓展中国美术史的视野，这是刘先生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和当时史学的变化也是相表里。当然他也有局限，他所使用的“美术”(fine arts)的定义和分类过于传统。今天我们认识到，“美术”的概念是17、18世纪以后，在欧洲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不同的文化中使用这类概念，要有所批判。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非常前沿了。到了1990年代，我们才比较全面地看到西方关于中国早期艺术史的研究，才知道青铜器在他们那里是一个核心问题，像罗樾(Max Loehr)、张光直，这些学者都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青铜纹样。日本也是如此。在他们那里，这是一个系统，而这边刘先生就做得很寂寞。

方辉：刘先生当时推荐给我们《文明与野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米海里斯的书是他的真爱，已经翻烂了，书皮他自己补了又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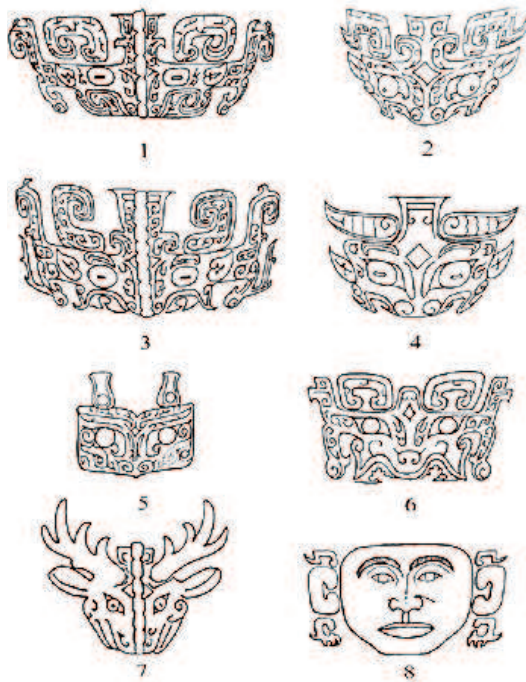
我们入校时，年轻的老师们都成长起来了，刘先生上的课并不多。他给我们讲的是“中国考古学史”。在讲中国考古学的来源时，他还是从西方考古学和艺术史的关系开始讲起的，如对古典时代艺术品的整理。实际上他是希望以西方的艺术史作为参照，建立我们自己的美术史，甚至考古学史——因为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史”这门课程里讲的。这

门课有36课时，他从国外讲到中国，再讲到青铜器，汉代以后的内容就不再讲。

刘先生美术史的论文在1980年代初开始陆续发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已是80年代中后期，有幸见到过来拜访刘先生的两位学者，一位是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还有一位就是张光直。也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已经关注到刘先生的研究了。实际上像张光直的通天说，用的也是和刘先生一样的文献，只是大家用不同的理论指导，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刘先生的一项美术考古研究，两城镇玉铎上的兽面纹(饕餮)——如果没有对青铜纹样的感受，是不会对玉器上的纹样这么敏感的。刘先生当年在两城镇调查时就注意到龙山陶片上的复杂纹样，认为它们和青铜器是可以联系的，他很自然地认为这件玉器是龙山来的。但这篇文章当时投给《考古》杂志的时候，《考古》给压成了一个豆腐块儿，因为那是一件征集品，把它断为史前文化确实冒有风险，所以最后只是以一个考古简讯的形式出现，大概有一百字(“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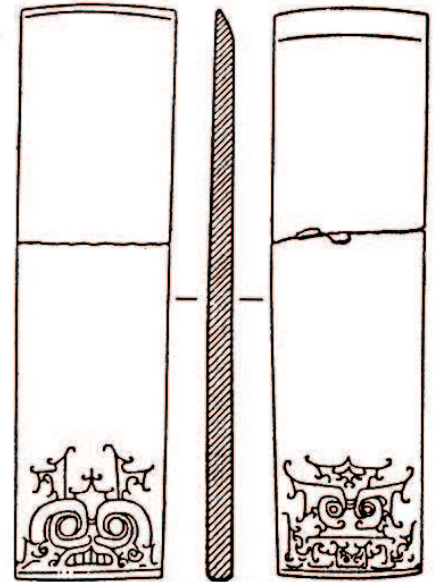
郑岩：这篇文章后来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其实乾隆收藏有这类带饕餮纹样的玉铎(也有人叫它玉圭)，但是乾隆是把它定到西周的。刘先生将它定在史前。后来一批流散在世界各地有同样风格的纹样的玉器都参照刘先生报道的这件玉铎重新断代，将它们归到龙



◀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铜牌

◀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及人面纹样。1-2.羊,3-4.牛,5.龙,6.虎,7.鹿,8.人面

兽面(饕餮)纹样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应用广泛。“如果我们更向前探索,这种纹样在原始艺术品中已屡有发现。”刘敦愿认为,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这件玉铎(右图),正反两面的纹样虽然“艺术造型方面的变化太大,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动物,但双目部分却十分突出,应是兽面纹样”。而两城镇文化的年代与夏代相当。并且,从工艺上推断,早期可能是绘制或雕刻于陶器、木器,易于着手,流行之后,才移植到玉这类坚致珍贵物质上。“因此可以设想,这件玉铎上所见的兽面,还不是最原始的形式,其起源可能还要提前。”



山时代。

这件玉器重要性在哪里呢?我们一说商周青铜器的纹样,最重要的就是饕餮纹。那么这种纹样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刘先生推进了对这一纹样起源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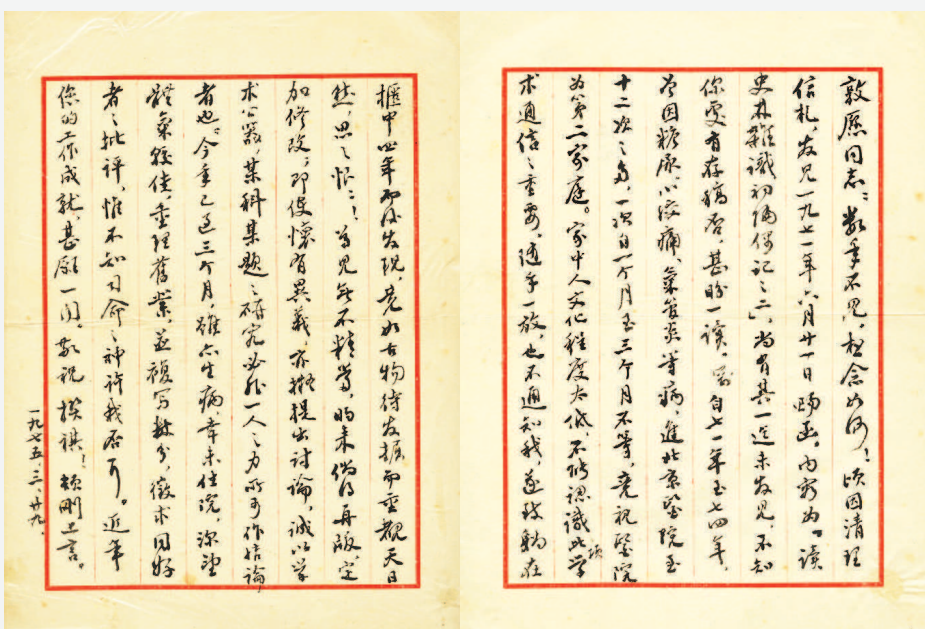
实际上,刘先生讨论了商代和西周十余种青铜纹样母

题;结合田野工作,在史前文化追溯其源头;通过战国画像铜器的研究,探求其转变与影响;用多个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多种维度全面发掘了青铜艺术的价值。

我昨天还在读他对兽面纹(饕餮)的讨论,他说对称的兽面纹可以剖分为二,合二又可

为一,其中应该有哲理,可能表现的是万物对立统一的关系。他说,阴阳五行的学说专门成学是在战国以后,但应该早有萌芽。这种观念,先于理论,在艺术上表达出来。还有像他写鸱鸢的那篇文章,那么早就谈

(下转6版) ▶



1975年3月29日,顾颉刚在家中“考古”,发现刘敦愿四年前一封学术通信竟深藏柜中,来信请求恐怕漏读的另一篇文章。(见“顾颉刚致刘敦愿书信四封”,刘陶整理/注释,发表于《温故(之十)》)



刘敦愿绘制的鸱师(左)和竹编纹